

## 從開國紀念日到跨年狂歡： 以媒體事件觀點分析 1994-2003 台灣跨年晚會<sup>\*\*</sup>

廖漢騰<sup>\*\*\*</sup>

### 《摘要》

要描述十年來（1994-2003）台灣國家級活動，新興的跨年晚會不但是政黨輪替的指標儀典（ceremony），同時也是媒體事件樣版。早期跨年活動的興起，可以說明陳水扁如何辦活動、改變節慶意義來營造政黨輪替氣氛，來取代舊的威權政權。然而，影音工業與媒體的角色漸漸吃重且有主導能力，這一點與台灣更早的國家級儀典或媒體活動相當不同，因此本文企圖以媒體事件的觀念來分析跨年晚會。媒體不但組織新的節慶、製造新的奇觀、紀念不太一樣的歷史事件、更重組集體記憶。本文認為，跨年晚會是所有台灣新興節慶中，最「媒體」的節慶。

關鍵詞：元旦、國慶、媒體事件、集體記憶、跨年、儀典

\*本文感謝蕭阿勤、鍾蔚文、及王志弘在寫作過程中的協助及意見；另外，中華傳播學會年會及學刊的匿名評審的意見，也協助作者更注意論文溝通方式、更清楚地形成本文的問題意識，一併致上謝意。

\*\*本文初稿曾經發表於中華傳播學會 2002 第六屆年會，原題目為「從開國紀念日到跨年狂歡：台北元旦做為集體記憶場址」；爾後，經過修改而成為本文。

\*\*\* 國立台灣大學新聞所碩士班研究生。E-mail: hanteng@ieec.org

## 壹、前言：台灣新世紀時刻做爲百年縮影

台灣政黨輪替後，總統府前的世紀跨年晚會出現了紀念八二三砲戰、九二一救難英雄、還有總統大「樂」兵等過去意象的再現。以下是總統府的新聞稿：

新世紀即將來臨，您正在為跨年晚會何處去傷腦筋嗎？一個有別於偶像、歌星趕場堆疊的綜藝晚會，一個國家級的跨年倒數晚會，一個以族群、文化、景觀向二十世紀致敬、歡喜迎接二十一世紀的嘉年華會，……倒數時刻，「廿世紀勇者圖像」將由憲兵機車連前導，國防部示範樂隊及三軍儀隊引領出八二三砲戰紀念影片、東西橫貫公路開拓史、九二一救難英雄……等群像；「禮炮齊鳴向廿世紀致敬」，則以國家最高軍禮——二十一響禮炮，向即將流逝的二十世紀致上最敬禮。(陳哲男，2000)

從以上的文字中，可以抽出幾個基本命題：

1. 跨年晚會常常是「偶像、歌星趕場堆疊的綜藝晚會」。
2. 總統府的跨年晚會，不是一般的跨年晚會。
3. 總統府的跨年晚會，是「國家級」的跨年晚會。
4. 「國家級」的跨年晚會，不但展現在「憲兵機車連、國防部示範樂隊、三軍儀隊、及禮炮」的陣仗上，更突顯在「八二三砲戰紀念影片、東西橫貫公路開拓史、九二一救難英雄……等群像」所構成的「廿世紀勇者圖像」。

就第一個命題「跨年晚會是綜藝晚會」來說，「綜藝晚會」的樣貌是台灣近年來興起的跨年晚會形式。台灣版的跨年晚會，是政府與民間媒體合辦<sup>(1)</sup>的綜藝晚會，其形式介於演唱會與綜藝節目之間，可以視

其為「加長型」的、「棚外」的綜藝節目。事實上，全台灣大大小小的跨年晚會幾乎不脫離由媒體與官方合辦的綜藝晚會形式，「偶像、歌星趕場堆疊」成為必然的現象。

總統府在辦世紀級、國家級的跨年晚會時，首要之務就是要突顯其「與眾不同」之處。2000-2001年的之所以能「國家級」，除了動員了唯有國家能動員、一般在雙十國慶日才會出現的「國軍」之外，也運用了過去的意象，如「八二三砲戰紀念影片、東西橫貫公路開拓史、九二一救難英雄……等群像」，而這些意象及「景觀」，是國家級的、是台灣的。

這個跨世紀、國家級的跨年晚會，和十年以前類似的國家級活動有顯著的不同。本文認為，新興的跨年晚會不但是政黨輪替的指標儀典(ceremony)，<sup>(2)</sup> 同時也是媒體事件樣版。本文首先會做一個歷史描述，談這樣的國家級活動變遷，與空間、媒體解嚴、及民進黨逐漸執政的關係；換句話說，陳水扁是如何辦活動、改變節慶意義來營造政黨輪替氣氛取代舊的威權政權。本文會接著以「媒體事件」的概念，來說明媒體的重要角色，是如何以一件又一件的媒體事件，組織新的節慶、製造新的奇觀、紀念不太一樣的歷史事件、進而以台灣熟悉地方式重組集體記憶，而跨年晚會為何是所有台灣新興節慶中，最「媒體」的媒體事件。

## 貳、歷史分析：新政府、新節慶、到跨年晚會

本文一開始所提及的 2000-2001「國家級」的跨年晚會，放在民進黨執政的脈絡下，只是眾多傳達「政黨輪替」訊息的活動之一。早在 1994 年的跨年晚會，陳水扁的「市民之夜」也傳達了「新台北」的訊息。陳水扁做為政治明星，民進黨從台北市長到總統的執政之路，開啓了「政治嘉年華」<sup>(3)</sup> 的氣氛——不但一開始以「快樂」、「希望」和剛解嚴後的國民黨做了區分，也讓之後的其他政黨學習模仿。

當民進黨陳水扁在 1994 年底選上首都的台北市長，伴隨著的話題

是一連串地以年輕、快樂、希望口號，來處理富有紀念味道的節慶，而1994-1995年「市民之夜」跨年晚會，可以算是最重要的例子。在陳水扁剛就任台北市長時，尚有許多城市空間與媒體空間因剛解嚴而少被市民利用，陳水扁以一連串的節慶事件，不僅改變公共文化環境的氣氛，更使自己成為城市空間改革者的創新者。以下會先說明1994-1998年陳水扁市長的新節慶活動與2000年迄今的陳水扁總統的新國家紀念節日，是如何設定新節奏以培養符合其執政「台灣」、「人權」形象的氣氛，再說明跨年晚會如何成為先是「新台北」、再成為「新國家」的慶典活動。

### 一、新節日與新紀念內涵

1994-2003年台灣節日的改變可分為二階段，一是陳水扁擔任台北市市長以辦新活動重新詮釋節日，二是陳水扁擔任總統改變國家紀念日。

#### (一) 陳水扁市長以辦新活動重新詮釋節日

1994年年底，勝選後的陳水扁市政府舉辦的跨年晚會，又稱「市民之夜」，不避嫌地直接說明是想要和過去劃清界限：「特別將歷年來嚴肅的升旗典禮改變為跨年聯歡晚會」，將「希望之鐘」響在「市民之夜」。<sup>(4)</sup> 這個由市政府辦的「市民之夜」，讓台灣跨年晚會有了新的知名度，而不只是參加人數不多的綜藝節目。接著1995年台灣光復節，陳水扁以台北市長的權力，於總統府前的「介壽路」、「介壽廣場」的，辦了一場「共鳴時刻——We Are Here」的颯舞活動，來「紀念終戰五十年」。最後，1996年介壽路改名為「凱達格蘭大道」，隨著颯舞、易名，變得「平民化」的道路，「見證時代變遷」。<sup>(5)</sup> 這些節慶與活動，讓陳水扁新任市長的新意，不但有和舊時代區隔的企圖，更有慶祝新時代來臨的氣氛。

時代氣氛在變動之時，也是集體記憶受到刺激的時候。在媒體與城

市空間逐漸解嚴與陳水扁當選市長的脈絡下，台灣的過去受到新一波「集體記憶」與「台灣人的歷史」的刺激與討論，節日、空間、活動，都是爭論戰場。顯著的例子之一，是在1995年，10月25日是「終戰」還是「光復」所引發的爭議，一直到今年2002年還繼續。<sup>(6)</sup>而學界也有一連串的反省及研究，大致上都可與陳水扁在台北市執政的新舉動扯上關係，如夏春祥（1998）討論1996年台北市將總統府前的「介壽路」改名為「凱達格蘭大道」，與張瑞德（2001[1998]）比較兩岸抗戰勝利五十週年紀念活動，都將當時新任的台北市長陳水扁的一連串舉動做為研究對象。

大致說來，台灣近十年來民間記憶抬頭質疑官方歷史，民間向官方媒體、政府要求空間，訴諸的是一個貼近人民、貼近本土的情緒，這是與先前威權時代高高在上的莊嚴情感，在「距離」上形成對比。陳水扁在「抓住群眾隱藏的心情」方面，的確比當時威權色彩仍濃的國民黨來的吸引人，這點也是1997年民進黨文宣部主任陳文茜所強調的，是陳水扁文宣最大優點；而陳文茜舉的例子就是如「聯考後辦青少年飆舞、又於總統府前舉辦飆舞」等等。<sup>(7)</sup>因此，本文認為陳水扁能執政，在文化象徵上與其成為「親民」的威權終結者相關，而辦「去官方化」的活動是重要手段，「市民之夜」、「飆舞」是例子。不僅如此，陳水扁辦的活動，有些如「市民之夜」與元旦開國紀念日的時間鄰近性、如「飆舞」舉辦在台灣光復節，也在一次一次的創意活動之後（至少在陳文茜眼中），改變紀念節日原有的官方味，而多了點節慶味。而這些改變，也為民進黨在紀念節日的更動上建立灘頭堡，而陳水扁在市長任內就鼓吹的二二八和平紀念日，<sup>(8)</sup>可以算是紀念節日更新努力的錦標旗。

## （二）陳水扁總統以更動曆法改變紀念方向

政黨輪替後的曆法更迭，可以從民進黨在中央執政後，數次修改「紀念日及節日實行條例」在幾項進入大眾傳媒及立法院爭論中，看出兩個最受矚目的二個主題：偉人紀念日的淡出與二二八紀念日的突出。<sup>(9)</sup>當

然，台灣政黨輪替後的曆法節奏及模式的轉變幅度，雖不如 Ozouf (1988)眼中的法國大革命慶典，或 Cressy (1989)以國族記憶角度看的英國新教曆法，然而曆法做為宣告及散播新的國族文化仍是有效的說法。這種以國家節慶更動，來詮釋國族文化形塑企圖的說法，也可以解釋為何民進黨執政下的在野政黨，會以法定假日的更動幅度，做為民進黨政權與「中華民國」合法符號的距離。<sup>(10)</sup>

以年為單位的國家曆法來說，國定假日的變化的確反應了國族內涵的變遷。<sup>(11)</sup> 觀察假日的變化，不難發現一些原來與中華民國歷史相關的節日，如九三軍人節(來源是日本受降)、三二九青年節(來源是黃花岡)等，甚至是全世界的五一勞動節，都以「身份別」為理由，而取消假日。<sup>(12)</sup> 偉人相關節日只紀念而不放假，則承襲移去蔣公銅像的去權威努力。增加的部份，二二八和平紀念日，則與元旦及國慶假日同列三個能放假的紀念日。最後還有民俗的節日，加上了原來沒有的原住民族歲時祭儀。這些政黨輪替後的曆法更迭，說明了民進黨對中華民國承襲及修正的部份。

### (三) 民進黨節慶的新敘事主軸：人權與台灣

總結來說，民進黨更動節慶內容與紀念日的努力，主要是強調人權與台灣這二個主題。舉例來說，同樣是中華民國的國慶日和青年節，民進黨執政下的活動內容，的確在挑選歷史素材、情感記憶上，有明顯的改變。

2000年雙十國慶與2002年的青年節活動，可以做為表達「人權」與「台灣脈絡化」兩個主題的具體例子。在2000年國慶日前夕，陳總統參加在總統府前「反閱兵」、廢除刑法一百條的抗議活動。<sup>(13)</sup> 陳水扁以紀念箝制政治言論自由的刑法第一百條的廢除，強調威權已過去、歷史邁進自由、民主、人權。選擇不一樣的過去來紀念國家節慶，民進黨以人權抗議，對比於威權閱兵，替隔日的「綠色國慶」做了新宣示。以「人權」重新詮釋中華民國節慶的另一個例子是2002年的青年節，

台北市有一個 329「人權青年之夜演唱會」，<sup>(14)</sup> 是由民進黨中央黨部青年部所辦的「新公民運動系列活動」之一。

民進黨以「人權」與「台灣」兩個主題重新詮釋節慶內容，與前述曆法更迭—偉人紀念日淡出與二二八紀念日突出—相映。從曆法更動到素材選擇，民進黨的確在節慶活動方面，以不同的過去、不同的敘事，給予台灣民眾「政黨輪替」的感覺。這類節慶活動的轉變，對台灣政治社會、國族文化影響等等，是值得深入探討的。

## 二、跨年晚會與新城市 / 媒體空間

跨年晚會，是眾多鞏固民進黨「新」價值的節慶活動之中，最顯著的例子。一方面跨年做為新節慶的潛力，不論是在城市空間活動或媒體事件上，在陳水扁 1994 年年底剛任市長時都尚未開發；一方面跨年晚會自 1994 年以來，個數與規模愈來愈大，甚至有成為新國家慶典的趨勢。

跨年晚會、光復節總統府前的颯舞、等，在陳水扁從 1994 年年底到 1998 年年底的台北市長任期內，可以看成是以辦一連串以流行文化、民間媒體協辦的活動，來向威權時期的媒體與城市空間爭取一個民眾的、生活的新空間。當時兩大報中時、聯合的元旦頭版，具體而微地呈現社會變遷，重心從元旦領袖偏至民眾生活，換句話說，從元旦到跨年。因為兩大報這方面的改變與傾向相似，下面就只對中國時報的元旦頭版做一些說明。

### (一) 跨年晚會看時代變遷

1996 年元旦，中國時報首次把將夜晚的跨年活動搬到頭版。頭版照片介紹的是台北市五星級富有國際觀意味的飯店所辦的跨年晚會，圖說說明的是台北東區遠企中心前的「倒數計時」。照片上方是李總統的官方元旦文告，強調兩岸李六點及江八點的排比，下方則是江澤民的新年談話。上下的新聞，來自兩岸高層的政治喊話，淡的是元旦做為「中

國」的生日，濃的化不開的仍是關於「中國」二字含有國族意涵的政治及權力。然而，在台北跨年晚會照片及二岸領導政治喊話之外，上方頭版提要的國際焦點是，雪梨午夜迎新年的五光十色，並附上一張小型彩色照片。

當年，陳水扁當台北市市長滿一年，台灣民眾開始漸漸感受到，除了投票民主的進展之外，媒體上的政治人物展現也不再一樣：電子媒體報導的，也不再是首腦人物嚴肅的拜年及講話，背景再也不是一間房間加張桌子，台灣民眾在跨年開始發現政治人物的扮裝秀。<sup>(15)</sup> 儘管 1996 年台灣與中國的政治關係開始緊張，佔滿平面媒體的頭版版面，但陳水扁在台北運作的「市民主義」已在兩大報的市政版開始發酵，而跨年晚會，是符合他競選口號「希望的城市、快樂的市民」的另一個舞台。

稍早的 1995 年元旦，陳水扁剛選上台北市市長沒滿一個月，就已辦了第一個以「市民之夜」為號召的跨年晚會。聯合報、中國時報兩大報的報導中，「市民之夜」還沒登上頭版，只在市政版。不約而同的，兩大報也提到這是台北市「國際化」的想像，借用的是紐約市民的跨年倒數。<sup>(16)</sup> 這首次的「市民之夜」，根據聯合報的報導，約有上千人參加，跟往後的跨年晚會人數比起來並不算多，但陳水扁市長的媒體形象及媒體合作關係，在那時更加確立。像聯合報在一月十六日市政版，〈台北新象：告別冷衙門 迎接新市府〉，就強調陳水扁的新意，在於開放市府空間，為市民活動使用。該篇也提到，在首次「市民之夜」之前的耶誕夜，陳水扁所屬的福爾摩沙基金會，與 TVBS 電視台合作，就在市府廣場前，舉辦了一場青少年「自助 PARTY」。找媒體合辦跨年晚會，自從那時開始成為公式。

## （二）跨年晚會看媒體與政治的角色

儘管陳水扁找民間媒體合辦跨年晚會，手法與合作方式看來與在媒體、空間解嚴下的「市民社會」的概念息息相關，然而跨年活動仍有其政治特殊性。第一次名為「市民之夜」跨年晚會，可以解讀為陳水扁剛



選上台北市長未滿一個月，來宣傳「新」市政的媒體事件。陳水扁的政治對手連戰，也於 1997 年元旦，加入了跨年活動舉辦的行列，這也宣示了跨年晚會的政治性格。在中正紀念堂，由中時報系、中視、中廣等媒體合辦，當時副總統連戰的蒞臨，<sup>(17)</sup> 說明了原先元旦的政治時空位置，被跨年晚會取代的趨勢。陳水扁、連戰兩人都感知到了，集體動員的趨動力變了，要學著迎合台灣人民感情結構變化。廣場加上音樂的活動慢慢成為人氣的保證，這樣以「快樂」、「希望」的動員方式，似乎比動員明星高中學生到總統府表演來的有政治效果。也不難想見，儘管空間、媒體已經解嚴，政治的優勢地位仍明顯，比方說 1997 年元旦，中國時報的頭版照片的圖說仍說明，這是連戰主持的跨年活動。

不過，雖然舊的動員方式改變了，但媒體做為動員要角，在適當的空間（夜間的廣場）辦活動，仍是不變的公式。陳水扁 1994 年底剛選上市長，用市民廣場與 TVBS 合作；連戰剛當副總統，用中正紀念堂，動員「中」字開頭的媒體合作。因此本文宣稱，跨年活動的興起與出現，與台灣解嚴後形成市民社會、民間力量相關，<sup>(18)</sup> 但並不意謂著有一個相對去政治化的、自主的市民社會形成。要回答是否去政治化，則首先要問的是，合辦的媒體是否可代表市民社會團體？

### （三）跨年晚會看市民、國民集合與新城市 / 媒體空間

回顧台灣這十年來節慶活動的轉變，可以說民進黨在以人權、台灣本土為價值的努力上，與市民社會需要的城市空間與媒體空間有一定的糾結關係，而這樣的關係，讓民進黨在走向以「市民」政府取代威權政府的執政故事上，獲得一定的支持。國家機器與民間媒體的合作，讓台灣近十年來的紀念與節慶活動，在媒體/空間活動的形式有一定的改變，而這樣的改變所創造的新氣氛，可以說是民進黨能執政的重要條件。

民進黨陳水扁於 2000 年選上總統，馬上就多了一個 2000-2001「跨世紀」的跨年晚會舞台。在跨年晚會毫無疑問地成為全世界的共同事件時，跨年晚會的地位似乎正取代元旦及雙十國慶，至少在 1999-2002 年

的跨年是如此。

### 三、跨年晚會成爲舉國歡騰的新國家節慶：從雙十閱兵、反閱兵遊行到跨年樂兵

若每年舉行的節慶活動，能形塑一群人的生活節奏，進而影響如何詮釋個人與集體的故事的話，進十年來台灣集體時刻及活動的重心，有從雙十國慶、元旦，轉向跨年晚會的趨勢。這樣的趨勢除了從媒體報導與民眾在空間上的參與的變化可以看出來之外，也在於跨年活動本身，有國家化、國慶化的傾向。

#### (一) 晚上跨年與白天元旦

原來中華民國的新年典禮是元旦升旗，跨年晚會則是後來附加之上的晚會活動。從曆法與國族的關係來看，元旦是中華民國開國紀念日，慶祝新的一年的到來，更慶祝開國。新開始，正是 Gillis (1994: 7-8) 眼中，建構一個國族的紀念慶典所必需的，所謂的「新開始的教派」(a cult of new beginnings)：國族記憶建構，總是以「新開始」爲信仰，如近一百年前的「新中國」將元旦定爲中華民國的「開國紀念日」，象徵了新民族的催生及與西方現代性看齊的時間觀。因此紀念活動如元旦，是觀察國族政治的重要場址。然而，台灣這十年內人民參與活動的重心，有從白天到晚上的改變：從元旦報紙的標題來觀察，一次又一次的「新開始」，元旦在「首都台北」的變化，從「反攻大陸」，到「主權在民」的白天宣示，到「快樂希望」到「千禧全球」的晚會狂歡。<sup>(19)</sup>

#### (二) 歡樂跨年與簡樸國慶

1999-2002 年的跨年活動，在官辦規模及民間參與上，有取代雙十國慶的趨勢。根據報載與官方說法，1999-2002 年的國慶與跨年活動規模消長，與台灣這幾年的天災、政經事件息息相關。這三年的國慶日，雖說橫跨台灣首次政黨輪替，卻有類似的低調：首先是 1999 年李登輝、

連戰仍是國家元首時，十月十日的國慶因為剛發生百年首見的九二一大地震，而「家破山河變 簡單過雙十」。<sup>(20)</sup>再來的 2000 年的國慶換了陳水扁做總統，國慶日當天國民黨連戰、親民黨宋楚瑜兩位在野黨主席的不出席，落空的「政黨和解」使國慶日「有人歡欣鼓舞，就有人鬱卒苦悶」的尷尬。<sup>(21)</sup>最後，2001 年的國慶，正逢九一六納莉風災、美國九一一恐怖攻擊與台灣經濟狀況不佳：「內緊外憂 雙十國慶活動 一切從簡」。<sup>(22)</sup>相較國慶活動的簡樸，這三年的跨年活動都熱鬧。1999 跨 2000 年是「迎千禧年」、2000 跨 2001 是「迎新世紀」、西元百年與千年的世紀時間感，讓跨年活動不受影響的熱鬧。

### (三) 閱兵、反閱兵、到大樂兵

跨年活動漸漸取代國慶、元旦，也展現在 2001-2002 年的「國家級」跨年活動本身的國慶化。國家不僅動員「憲兵機車連、國防部示範樂隊、三軍儀隊（陳哲男，2000）、及禮炮」的陣仗，也搬出「八二三砲戰紀念影片、東西橫貫公路開拓史、九二一救難英雄……等群像」所構成的「廿世紀勇者圖像」。相較之下，稍早民進黨執政後第一個 2000 年雙十國慶，成為媒體關著的紀念焦點則是「反閱兵」，要批評的正是先前兩蔣時期國慶日閱兵所展現的國家暴力。2001-2002 跨年則是有「大樂兵」：

這支狂歡不夜的歡樂遊行隊伍，將以生態、流行、國際、未來等四大主題形塑各具特色的造型，在災區小朋友擔任遊行總指揮的號令下，浩浩盪盪通過總統府前「大樂兵」台，接受阿扁總統親自校閱。（陳哲男，2000）

雙十國慶的「閱兵」意象，現在變成「阿扁總統」在跨年晚會的「大樂(閱)兵」。儘管這份新聞稿是由官方撰寫，而這個跨年晚會是由總統府設計、主辦並宣傳，表面上看來不能代表「民間集體記憶」，但若深究總統府企圖強調政黨輪替後的「改變」氛圍，又要符合跨年晚會的歡

愉氣氛，不談有意義但嚴肅的「反閱兵」，而設計出「大樂(閱)兵」，讓凡是記得兩蔣時代雙十閱兵的，不論是直接參與或是電視轉播，都能感受到一種改變。這正是一種由記憶產生出的歷史感，是由「閱兵」改成「樂兵」的視覺及符號意象所帶出來的。

#### 四、小結：新節慶造就新政府，為新認同打造新節慶

伴隨著解嚴後民進黨在首都與中央的相繼執政，陳水扁辦活動的「政治嘉年華」路線，與台灣空間、媒體解嚴的環境相輔相成。藉由「市民之夜」為首的一連串節慶活動中，民進黨一方面描繪未來為「快樂」、「希望」，也企圖敘事一個不一樣的過去。節慶節奏安排上，其中明顯的例子，如雙十節與青年節的淡出，二二八和平紀念日及跨年晚會。「新」節慶活動的潛力，成就了執政的民進黨；執政的民進黨重新組織、發掘節日來為認同的需求出力。

近十年來台灣節慶、紀念活動與媒體密切關係：媒體可以同時是主辦者與廣播者。加上媒體對民進黨新節慶活動的詮釋，都使得節慶事件成為媒體事件。儘管台灣解嚴後的媒體多樣化，但媒體與政黨間的複雜關係，更使這些節慶與媒體事件有不少的緊張關係。這個緊張、複雜的關係，在陳水扁以「去官方」色彩執政後，還是要辦「官方紀念活動」來形塑國家共同體的內涵而更形複雜。2002年底金馬獎典禮是否要邀請陳水扁總統致詞的爭議，算是這緊張關係的病徵。<sup>(23)</sup> 這病徵迫使本文要更細緻地處理媒體在節慶變遷上的角色，並且提問，是「市民」參與、還是「視民」觀看？以下回顧媒體事件與節慶如何凝聚現代社會，並推敲這兩者做為文化公共領域的侷限及可能性。

## 參、概念回顧：媒體事件與節慶

### 一、媒體事件與公共儀典(ceremony)

兩蔣拜年講話、國慶閱兵、市民之夜、跨年樂兵等等，這些活動不論新舊，雖在不同的時空下，都共同享有一個面向—都是以廣播散播，在某個時刻傳播給在台灣生活或與台灣有關的人。這些活動的另外一個共同點是其公共的性質；都是政府或政黨組織、媒體報導、電視廣播的公共儀典(ceremony)。這些公共儀典本身需要媒體來完成，因此在概念化這些公共儀典時，媒體做為社會儀式或典禮的面向會較突出。換句話說，在某個時刻，媒體會將一群人凝聚在一起，而不只是傳遞訊息。

#### (一) 媒體在公共儀典角色

現代化社會中，廣播媒體現場直播的收視，可算是最顯著的例子，媒體會將一群人凝聚在一起，這也是 Daniel Dayan 與 Elihu Katz (1992) 在《媒體事件：<sup>(24)</sup>歷史的現場轉播》一書所提出的媒體事件的最基本概念。即時直播、吸引最多觀眾、沒得選擇的集體觀影、打斷生活常規，讓媒體事件有了光環，讓人們聚在一起形成「我們」，這些特性是讓 Dayan & Katz (1992) 將媒體事件與一般新聞報導的活動及事件區分開來的原因。簡單說，媒體事件「讓電視機有了光環，而轉變了觀影經驗」(Dayan & Katz, 1992: 1)。

Dayan & Katz (1992) 的媒體事件可以是突發新聞事件、社會情境劇、或者是固定發生的公共儀典，而本文著重在公共儀典。公共儀典本身加上廣播媒體現場直播的收視(可以視為另外一種公共「觀看」儀典)，凝聚更多人，成為一個「媒體事件」，而整個媒體事件可以視為原公共儀典的延伸。或者更精確地來說，許多公共儀典非得有媒體不可，媒體實踐影響了公共儀典的實踐。

## (二) 媒體事件的薩滿教(Shaman)巫師魔力

在公共儀典的時刻，媒體事件凝聚群眾，這個說法是 Dayan & Katz (1992)延續了涂爾幹以來的結構-功能主義的觀點，說明媒體事件的整合功能及效果。媒體事件的主要功能，Dayan & Katz (1992: 20-21)總結為社會整合：「這些報導以激勵人心的集體方式整合了社會，並重新喚起人們對社會與合法權威的忠誠。」。又如 Dayan & Katz (1992) 解釋為何研究媒體事件的十多個理由中的前幾個，是可以以媒體效果論理解的，如吸引世界史上最多的觀眾；讓電子媒體的火力全開、潛能全用上；媒體整合並設計社會的結構(至少是暫時的)。

Dayan & Katz (1992) 雖然滿口媒體效果論，但其吸納如人類學、批判理論的企圖，豐富了媒體事件做為分析概念的基礎。<sup>(25)</sup> 在對公共儀典的影響方面，媒體事件的效果，像民間宗教，同時征服了時空，甚至創造節日。Dayan & Katz (1992) 較創新的地方，不在於媒體效果論本身的延續，而是在於引入人類學關於儀式觀點的理論。媒體事件像 Lévi-Strauss (1963) 提的薩滿教巫師 (Shaman)一樣，同時在符號界與實體界，凝聚社會，也可以轉換社會的治療魔術效果 (Dayan & Katz 1992)。

## (三) 媒體事件的類型區分：是儀典、節慶、還是奇觀？

媒體事件若像薩滿教巫師 (Shaman) 一樣，那其效果是來自魔法還是儀式本身？電視現場轉播的凝聚社會效果是來自奇觀的觀影呢，還是儀典式的觀影呢？在區分儀典與奇觀方面，Dayan & Katz (1992) 主要是依賴 MacAloon(1984) 類型比較，認為在光譜的一端是奇觀 (spectacle)，電影是奇觀的極端形式；而在另一端的是節慶 (festival)，幾乎沒有奇觀的成分；儀典 (ceremony) 則在兩者之間。或許是為了強調社會整合說的面向，Dayan & Katz (1992)的媒體事件概念，則主要在儀典上打轉，而很少細說另兩種類型——節慶與奇觀——概念的歷史背

景。關於這兩種類型與對社會整合說的批評，本文會在文獻回顧小結時，納入如 DeBord (1969/1977)的奇觀等觀念。

媒體事件做為凝聚整體的儀典，Dayan & Katz (1992)更進一步吸納批判理論一些基本觀點，認為媒體事件的性格是主控的(hegemonic)、是自稱歷史的 (proclaimed historic)，因而有整合社會的能力。Dayan & Katz (1992)承認媒體事件常是如政府、政黨、大媒體等建制集體 (establishment)的產物，因而媒體事件常有定義什麼是歷史、什麼是重大的影響力。Dayan & Katz (1992: 20-21)列出幾個觀察整合作用的方向：「(1)媒介事件提醒我們什麼應當被記住；(2)媒介事件成為頗具魅力的集體行動，維護已建立的權威；(3)某些媒介事件具有內在的解放功能和轉換功能。」由以上幾點可看出，Dayan & Katz (1992) 在承認媒介事件本身是支配的、並自稱歷史之外，也指出某些媒體事件本質上有解放潛質，做為轉換(transformative)社會的力量，做為對抗的事件挑戰主控的。這轉換社會的部份將等往下闡明「這是新時代」提案概念時，再加以詳論。

Dayan & Katz (1992)的媒體事件概念，也因此有了文化人類學與政治社會學的視角。「媒介事件<sup>(26)</sup> 是大眾傳媒的狂歡節，是中心價值觀與集體記憶的聚焦。」就是很好的摘要，是由龔浩群(2002)評論九一一做媒體事件的劈頭第一句。前半「是大眾傳媒的狂歡節」強調儀典的文化人類學觀點；後半「是中心價值觀與集體記憶的聚焦」則說明了媒體事件支配的、自稱歷史的政治社會性格，而媒體事件的聚焦在於打斷廣播的時程、讓所有的頻道報導、因而創造了一個文化情境，使得觀看幾乎成為公民的必經儀式。媒體事件雖然發生在某一個時間點，但也常處理過去，也成為該記得的過去。

## 二、媒體事件與歷史敘事

「媒體事件是.....集體記憶的聚焦。」龔浩群(2002)讀出了《媒體事件》一書副標「歷史的現場廣播」中的「歷史」兩字意涵。大寫的歷

史，在媒體事件的大眾現場廣播下，其播放及觀影本身，就是一個儀典，不僅會處理歷史記憶，本身也可能成爲歷史記憶。Dayan & Katz (1992: 211-213)，將媒體事件對集體記憶的影響列出五點：

1. 媒體事件是電子紀念碑 / 歷史遺跡 (electronic monuments)；
2. 媒體事件所賦予集體記憶的，不只是實體還有框架：媒體事件是組織個人及歷史時間的助憶符號(mnemonics)；
3. 媒體事件是打斷時間的干擾，常標誌的一個時代(era)的開始或結束；
4. 媒體事件編輯、並再編輯集體記憶。
5. 所以，媒體事件及其敘事在定義集體記憶時，與歷史寫作相互競爭。

媒體事件要做「歷史的現場廣播」，爲了簡要地處理稍早發生的過往及歷史背景，會組織助憶符號 (mnemonics)，同時與歷史寫作相互競爭。媒體事件的記憶敘事效果，在伴隨著電子媒體近年來興起的數位典藏化、知識管理化，以及企望以回收歷史新聞鏡頭來增加新聞深度的想像趨勢之下，會更形關鍵。<sup>(27)</sup> 不只如此，媒體化的歷史事件，如同 Nora (2002)描述當代「記憶高漲」(upsurge of memory)的文化情境類似，過去的經驗在文化傳承商品化、媒體民主化、政治認同化的背景下，記憶不再是直接經驗的積累而是「半生不熟」的助憶符號 (mnemonics)。當 Nora (1989)針對當化記憶文化物如紀念碑、紀念日做「記憶場址」(realms of memory)的相關研究時，媒體事件做爲一種「電子紀念碑」的研究也在近年興起。如 Barbie Zelizer (1992)研究甘迺迪暗殺，與 Alexander & Jacobs (1998)研究水門案及洛杉磯多位白人警察痛毆一位黑人金羅內 (Rodney King) 事件、等等。

### (一) 電子記憶與歷史轉播

做爲說故事、辦活動的媒體，媒體與儀式化 (ritualization) 和小說



化(fictionalization)的聯盟，讓專業的歷史記錄與實際上被記憶的脫節情形，更加彰顯。若真的媒體與其他宣稱是集體記憶的內容合作，取代歷史的社會整合角色，則 Dayan & Katz (1992)眼中的媒體事件則是效果宏大的「歷史」的現場廣播：讓某某媒體帶你們目擊／回顧／參與這個歷史時刻。

正如同法國歷史學 Nora (1989)的「集體記憶場址」概念所強調的，現在記憶的不是貼身、原出的經驗，而是歷史與記憶的混雜物。做為電子紀念碑的媒體事件，被記得的常常不是上演的事件本身，而是以被廣播的形式記憶下來的。本文相信如台灣兩蔣時期的國慶閱兵，記下來的常是電視轉播。媒體事件組織個人及歷史時間的助憶符號(mnemonics)。的確，媒體事件影響集體記憶最重要的機制在於，打斷日常時間的干擾，形成一個儀典，紀念過去展向未來，而常成為標誌的一個時代的開始或結束。其中有一類媒體事件，Dayan & Katz (1992)稱之為「具轉換能力的」(transformative)的公共儀典，或媒體事件。具轉換能力的儀典，為改變提案穿上正式的外衣，可稱為「這是新時代」(This is a new Era)的提案 (Dayan & Katz, 1992)。

## (二) 「這是新時代」的提案

「這是新時代」的媒體事件，依 Dayan & Katz (1992) 舉的主要例子來看，特別是指韓國、以色列、及波蘭發生的，宣告更開放的後冷戰(postwar)新時代。由於這些媒體事件，Dayan & Katz (1992: 182)認為新時代的來臨，不是往未知，而有點像回家：「『這是新時代』的提案，為了宣告一個時代的結束，會找出一些能使現在的新提案、新主張生效的舊時代意象。」

「這是新時代」的提案使媒體將心力聚焦於如此的舊時代，會產生一個集體記憶的重組，甚至會改變地理及時間的感知。Dayan & Katz (1992)以此來詮釋南北韓家庭重聚說明了血緣連絡比鐵幕強的新時代要來臨，而本文則是將「這是新時代」的概念，來處理民進黨如何創造

拾級執政的氛圍。

「這是新時代」的提案，也因此理論概念上，是挑戰支配的(hegemonic)價值。Dayan & Katz (1992)在這方面的立論及例子，受限於其歷史觀而有過份樂觀及英雄主義傾向，但仍有效地說明就在支配的價值之外，提出媒體事件仍有空間，可以改變參考架構、提出新地方感、時間感的典範、並擊退其他衝突記憶的記憶痕跡。換句話說，是反對派以提出的新方案重整集體記憶，而展演成功的關鍵在於需要公眾對新方案的同理心，才能對長期鬱積、表面上無解的問題，啟動改變的儀式。研究法國大革命節慶典禮 Ozouf (1988)也認為，革命新的節慶與典禮，在轉換民間的文化價值及確認新時代的到來，經過民眾認同的部份才是成功的。

### (三) 媒體事件做為新文化公共領域？

除了將媒體事件連上公共儀典及歷史敘事之外，Dayan & Katz (1992)的主要貢獻之一，是在當代媒體感知經驗中，從「分心」(distraction)看到了「歷史的現場轉播」的集中聚焦特徵。從眾人分眾分心到集體專心觀影，儀典才能「公共」及敘事才能「歷史」。該書的副標「歷史的現場轉播」的現場轉播四字，讓平日平庸例行的電視，突然有了 Dayan & Katz (1992: 4)所描繪的「光環」(Television with a Halo)，吸引原來日常分散且分心的注意力：有光環的電視就像停止日常例律的假期，給予人們集體見證、思考、行動的時刻，就像傳統的儀典與節慶：在難得卻要緊的時刻，媒體發揮了整合功能，這次帶有人類學的儀式光環。

提出新時代提案的反對派領袖，在 Dayan & Katz (1992)眼中，就是操弄這人類學的儀式光環的要角，也因此是原始部落的巫師(shaman)，以符號及語藝凝聚、轉換、並治療社會整體，若這個巫師能一步步帶領群眾並追溯探究群眾的腳步，則巫師不僅僅是巫師而是吟遊詩人。Dayan & Katz (1992)的巫師或吟遊詩人的溝通形式與內容，不再僅限於理性內容，而是有文化、情緒的複雜面向。

也因此巫師的咒語或吟遊詩人的詩歌的魔力不在於內容真假，甚至也不在於理性溝通，而在於運用共享符號說出令人信服的故事。媒體事件中最具顯著意義的，如同 Dayan & Katz (1992: 155)所發現的，是成功的「假事件」(pseudo-events)，因為這樣的媒體事件、公共儀典有「引發事件的能力」(causative power)。這觀點帶領我們重新思考公共領域的儀式、文化面向，還有更重要的，引發社會改變的公共領域事件。

Alexander & Jacobs (1998)以「大眾傳播、儀式、與市民社會」為題，將 Dayan & Katz (1992)的媒體事件概念，做為活化自由主義傳統下的公共領域概念。Alexander & Jacobs(1998)以 Dayan & Katz (1992)的概念，補充 Habermas (1962/1989) 理性溝通達成共識為基調的公共領域概念的諸多不足，彰顯公共領域應該同時也是一個讓分化社會能形成集體認同及團結的「文化空間」，而支撐並鞏固市民社會的正是由電子廣播媒體的儀式角色所維繫的，共享的信念及共通的文化框架。以媒體事件做為公共領域與市民社會的判斷指標，則龔浩群(2002)與 Sun (2001)對中國大陸的討論，可以進一步做為參考。將媒體事件看成一個文化環境、文化空間，也說明了媒體事件無法以認知的架構來理解，因為媒體事件創造的是一個文化情境，所以需要一個文化的架構來分析。

### 三、小結：媒體事件形塑的市民社會

#### (一) 危機、轉機、與「這是新時代」的改變提案

Dayan & Katz (1992)在媒體事件具有宣稱「這是新時代」的改變提案的立論，放在 Alexander & Jacobs (1998)所建議的文化公共領域概念之下，可以用來幫助概念化媒體事件形塑的市民社會。Alexander & Jacobs (1998)以傳統對市民社會的「實為如此」與「應為如此」的想像差距，來為媒體事件是慶祝型或是危機型定調：若「實為如此」與「應為如此」的差距小，則是慶祝型的媒體事件，如民進黨執政後的節慶活動；若「實為如此」與「應為如此」的差距大，則是危機型的媒體事件，

如民進黨執政前的黨外抗議活動。Dayan & Katz (1992)所談的「這是新時代」的改變提案，做為一個具有社會轉換潛力的媒體事件，就是在突顯「實為如此」與「應為如此」的差距大，是一個要改變的危機，也就是舊時代，而新時代的提案的目標在於提供一個使差距變小的方案，使危機型事件轉變成慶祝型事件。

## (二) 反省社會整合論

媒體事件以文化儀式的觀點達成社會整合的說法，並不是所有理論家的共識。像發展奇觀(spectacle)一詞概念的 Guy Debord (1969/1977)，會認為媒體事件不是整合，而是資本社會虛假意識的齊一化(unification)。(28) Dayan & Katz (1992)雖然也有類似將媒體事件描述成奇觀、官方時間、大歷史、等等，但對他們來說，電視所擁有的是「光暈」，而不是 Debord (1969/1977)描述的要被打倒的眩目影音催眠術。到底電視因媒介事件擁有的光環，是光明的救贖，還是眩目的圈套？

在對社會整體論或齊一論的極端悲觀與過分樂觀之間，Dayan & Katz (1992)吸納批判理論，提出了一個相對穩定的中心價值模型。近年來學界及實務界浮現的，是另外一種以相對衝突模型出發的概念，同樣是以影像影響力為主，是由幾位關心全球環保抗爭及反全球化運動的媒體理論家為代表，如 DeLuca & Peeples(2002)提出的「公共螢幕」(public screen)、「影像事件」(image event)或 Garcia & Lovink (1997)所倡議的「策略媒體」(tactic media)。同樣認知到當代電子廣播媒體的聚焦效果，DeLuca & Peeples(2002)給與抗議活動中的「象徵暴力」(symbolic violence)與「非文明不合作運動」(uncivil disobedience)新的公共意義位置，認為在當今媒體環境下，這些在公共螢幕上，以衝突的影像介入世界貿易協會(WTO)或奧林匹克運動會的媒體事件，是需要在參與式民主的考量下，探討其限制及可能性；Garcia & Lovink (1997)也以強調「策略性」媒體，如何攔截主流媒體的議題設定能力。這些相對衝突模型出發的概念，不論是 DeLuca & Peeples (2002)的「公共螢幕」(public screen)

或是 Garcia & Lovink (1997)所倡儀的「策略媒體」(tactic media)，雖然不至於宣稱「這是新時代」，但也認可媒體事件有影響力，差別在於這些概念所描述的媒體事件更有衝突因子及危機意識，也因此較難為主流建制媒體所接受，更遑論成為具主控能力的新價值。總之，不論是整合或是衝突，媒體事件的社會轉換與凝聚能力是當代文化情境不可忽視的現象。

## 肆、再詮釋：政黨輪替的媒體事件與公共儀典

### 一、為何要再詮釋

媒體事件與公共儀典兩者做為文化領域的概念，在台灣從威權體制、民主化到政黨輪替的過程下，可用來分析文化公共領域的變與不變。本文認為媒體事件與公共儀典兩者，做為社會整體性的觸媒，能創造了一種情緒性時刻，在那時刻，人們溫習舊有整體感時，並對新興問題考慮新的提案。因此不能單以假事件或非民主來批評，端看參與者是驗證了儀典及事件的企圖呢，還是嘲弄為大笑話；可以主動參與，也可以冷笑以對的選擇本身，簡單來說，也正是民主與威權的差別。

媒體事件與公共儀典概念本身，觸及社會學傳統所關心的整體性問題。詮釋這兩者，就在詮釋社會整體、國族想像。當然，詮釋媒體事件與公共儀典的轉變，也需要處理這十多年來，媒體及空間解嚴的變化。再者，詮釋媒體事件與公共儀典，更能說明制度、法令、甚至是政經環境的改變，並不能完全保證全面且實質的改變。除了法令的解嚴之外，本文更努力探討的，文化上宣稱的「這是新的時代」，是如何以一連串的新媒體及儀典事件改變的，又改變的內涵為何，如此我們才能在理性溝通為前提的公共領域之外，回答台灣的市民社會，是否自主的問題。

## 二、慶祝媒體事件：從閱兵到跨年的國家儀典

同時是年度國家節慶，而又要有足夠的媒體報導(最好是電子媒體現場直播)，這樣的例子不多，除了元旦之外，就是國慶(閱兵)及跨年(晚會)了。要將國家節慶的電子媒體直播，看成一個具有社會整合意涵的媒體事件，不但可以從中探討其整合的條件及折衝，及媒體與政治的文化關係。

### (一) 全國唯一閱兵典儀的集中直播

雖說「現場直播」在台灣 SNG 採訪浮濫的情況之下，似乎失去了 Dayan & Katz (1992)所說的光環神效，不過在早期無線三台時代，「現場直播」加上三台「連播」，可以說是沒得選擇的唯一選擇。早期台灣的國慶閱兵，是在體育運動事件之外，當時少數集體「現場直播」的媒體事件。國慶閱兵轉播，可以 Dayan & Katz (1992)的媒體事件概念核心，儀典(ceremony)，來說明儀典的法例 (ceremonial enactments)，是如何定義了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關係，同時符合 Max Weber (1946)提出的權威合法性基礎。如同 1950 年代開始的電視廣播，有不少以創造服務當時政治情境的電子儀典(Dayan & Katz, 1992)。兩蔣時期電子媒體與黨國不分的情況下，媒體在國慶閱兵轉播是配角，是添加光環的角色，這和後來媒體成為跨年晚會的主要角色是完全不一樣的。國慶閱兵轉播的時程，可以想像的是象徵性地由典禮的司儀維持，儘可能精確地照表安排，排入轉播的時段，而國慶閱兵當天的假日，也企圖提供人們集體見證中華民國存在的機會。

在沒有其他節目可供選擇的時候，國慶閱兵甚至還提供了壯觀的武器與軍儀隊展演。早期台灣國慶閱兵的電視轉播，在構圖上多以幾何線條為主，依賴天氣好壞提供飛機表演的背景，還有各種軍事化身體的一致性與整體性。國軍做為國家整體性的保障的訊息，就在國慶閱兵的儀典及媒體事件上開展。早期台灣的國慶閱兵，或許不能稱為戲劇化，如

近年來突發的新聞事件一樣，但在當時台灣影像流通相對稀少的時代，國慶閱兵的確有吸引了大量觀眾的官能性。連 1991 年民進黨拒絕參加國慶而聲援「反閱兵」的抗議活動時，聯合報的報導特別突顯當時的民進黨主席黃信介與民進黨籍縣長周清玉，不太能抗拒國慶閱兵帶來的視覺感官及對國家整體保障的信心：黃信介雖然沒有去親身參加，但仍「從電視轉播觀賞整個閱兵過程」並對國家主辦閱兵達到展示軍力效果表示肯定態度<sup>(29)</sup>；周清玉，要求大眾思考當年為何會有反閱兵遊行時，還不忘強調「卅年前她在台大讀書時，為觀看國慶閱兵大典，和許多同學興奮地在台北街頭佇立一天一夜，也不為苦。」<sup>(30)</sup>從黃信介與周清玉兩位民進黨元老對閱兵典禮的詮釋來看，當時的閱兵典禮仍有整體感的象徵意涵。

1991 年有反閱兵介入的國慶，和 2000 年政黨輪替的國慶兩相對照，可以看出一些在儀典意義的改變企圖，「配合陳水扁總統平民化作風」、「多元化風貌」，等描述字眼出現在記者的導言。<sup>(31)</sup>儀典中原來一名操國語的青年代表致詞，由國台客原住民四個取代；在憲兵連後，不是空軍陸軍儀隊(全部移到二個月後的跨年晚會了)，而是民眾的休閒工具如吉普車、滑板車等。再者，媒體及民眾的注意力多從國慶移往跨年狂歡，使得國慶意義及形式也產生改變。在這裡，媒體對已存在的公共儀典具體形式，產生 Dayan & Katz (1992)所歸納的影響之一，就是對儀典的重新改組。在本文第二部分的歷史分析，就有討論到這近十年來的媒體主辦活動與現場轉播，讓跨年晚會有點像國慶，國慶遊行有點像跨年。

## (二) 各地眾多跨年晚會的整理報導

閱兵與跨年都是媒體事件，然而近年來國慶白天的紀念活動，已在媒體環境及民眾生活的多元化下，失去原先媒體事件的光環。的確，在感知的部份，當代跨年所面對的媒體受眾是更加「分心的」：在跨年那時刻媒體收視的選擇多樣化，活動本身更是各地分散的市民活動；國慶

閱兵的典禮不僅活動集中在一個地方，早先連媒體直播與收看都是只有一個選擇。不過，正是因為跨年活動的多樣化，才會使媒體整合的角度更加突顯，媒體統合的不只是時間，還有行動 (Dayan & Katz, 1992)。在電視螢幕上，各地的跨年活動以子母畫面，以各地的記者的連線報導，媒體統合的不只是各地的活動，而且是各地「同時進行」的慶祝活動，來一起迎接新的一年。對於跨年，人們可以以視覺參加，也可以身體實踐。

「國家級」的跨年活動，除了在地點上與閱兵典禮相同的總統府前廣場還帶有國家味道之外，要和其他跨年活動做區分實在不易，這也是民進黨入主總統府後的大問題。2000-2001 年的跨年，就如同本文一開始所提的，帶入了許多國家級的過去意象，其挑選的方式也是相當有選擇的本土化。2001-2002 年的總統府跨年，則以一個「衛星啟動鈕」的按鈕儀式，來宣告將幸福、快樂傳輸到世界各地。<sup>(32)</sup> 總統陳水扁，以一個廣播者的角度按紐，不僅暗示了媒體形式介入跨年活動之深，也說明了跨年晚會不只是節慶、奇觀，更是國家、官方的媒體事件。然而，若要考究跨年晚會這十年來的主要變遷，就得談民進黨陳水扁如何以幸福、快樂的跨年晚會宣告新時代的來臨。

### 三、標誌新時代：民進黨陳水扁轉換提案

民進黨陳水扁的成功之處，以轉換型的媒體事件(transformative media events)概念來看，主要是在 1994-1995 年提出了有潛力的、但當時還未成主流的提案。正如同 Dayan & Katz (1992: 182)的簡語「這是新的時代」(This is a new Era)，那時 1995-1996 做為市長的陳水扁，不僅僅以一連串的媒體事件宣告新意，更進一步地在實體的城市空間上舉辦新的節慶活動，發揮對威權文化習慣的解放功能。

#### (一) 1994-1996 年陳水扁新提案

揭示新時代的來臨所辦的活動，從陳水扁首次以立法委員身份競選



台北市長開始。從「光復台北城」車隊遊行與「台北之夜」選舉造勢晚會開始，「市民化」、「社區化」、「年輕化」等口號是有解放潛力的。雖然當時台灣社會政治及媒體解嚴已有一段時間，但是像公共空間與青少年身體這兩者，文化意義上的解嚴仍未完全真正開展。空間與身體的新提案，可以從陳水扁當選市長後，宣告要將市政府從「衙門」改成「市民一處重要的集會或文化活動場所」看出，該行動則是馬上在聖誕節示範性的辦了「阿扁和他的自助舞會」。<sup>(33)</sup>

1995年光復節終戰「飆舞」與1996年元旦「飆旗」，不僅讓媒體重視所謂「年輕選票」的話題，更使總統府前廣場的使用及象徵成爲話題。一時青春身體在威權空間的行動，尤其是1995年光復節終戰「飆舞」時，在總統府前以各型車輛共鳴喇叭一分鐘來「解構威權」景況，也如同新聞所描述般的「空前」。<sup>(34)</sup>立法委員的陳水扁能從議場走向市政府的市長，是經過街頭與廣場的慶祝活動，在文化象徵上不只是「親民」、還是「開放」、「市民」來對當時主流的威權又親民的官方節慶及媒體事件做區隔。

當然有人問，陳水扁的「新」，是不是在作秀，這樣的質疑反映的是當時空間及媒體事件的興起：總要有場地（空間及媒體）才有秀可言。再者，陳水扁1995年光復節與1996年元旦所做的一連串活動，適逢台灣民主化後兩次重要的選舉事件，一個是1995年12月2日第三屆立法委員選舉與隔年3月23日第九任總統及副總統及第三屆國代選舉。當時尋求連任的總統李登輝參加光復節「飆舞」是否適當，陳水扁是否利用年輕人做爲選舉工具，和舉辦飆舞是否會因即興方式沒理念會出問題，等等，不僅成爲新聞話題，也成爲大選話題。<sup>(35)</sup>陳水扁快樂、希望、年輕的轉換提案，的確經由一連串的新聞事件，標誌新時代。

如同Daniel & Katz (1992)所說明的，新時代需要一些舊意象的記憶來確認新提案的內容，同時導致集體記憶的重新結構。總統府、光復節、凱達格蘭大道、二二八節日及公園，等等，就是這樣的例子。當Daniel & Katz (1992)以南北韓藉由兩邊家人重聚的現場直播，說明這媒體事件

改變了地方感及集體記憶，陳水扁在 1994-1996 年的關於空間及青少年身體的新提案，也在改變地方感及集體記憶上，藉由一連串新聞直播與隨後的話題討論，使新提案成效。

## （二）新節慶活動確立新建制集團

當民進黨陳水扁的「這是新時代」提案，經過一件件的媒體及節慶事件成爲主流，也可以說是新的活動組織者與活動廣播者的新建制集團的確立。除了與陳水扁關係曖昧的福爾摩沙基金會、台北市文化基金會、等等之外，如 TVBS 無線衛星台、全景社區廣播電台、台北之音也是協辦活動的要角，這些新的民間組織，可以說在陳水扁新時代提案成功後，與民進黨及民進黨政府同時成爲新建制集團，掌控新一波的媒體及節慶事件，也爲以「人權」、「本土」爲主軸地改變曆法及公共空間意涵提供條件，如台灣人權協會在推動二二八紀念節日化的努力。

當民進黨陳水扁種種作爲宣告「這是新時代」同時，宣告「這時新的一年」的跨年晚會——「市民晚會」——更是重要。跨年是媒體事件。跨年是媒體事件，首先在於跨年的時間即時性，讓媒體轉播成爲跨年不可或缺的要角，跨年的重要活動——倒數計時——更是完美的即時連線轉播的內容。其次，有些媒體不只是報導，本身更是某些跨年活動的「承辦單位」；媒體身兼事件組織者及報導轉播者兩職，更是讓跨年活動成爲「實在」的媒體事件——媒體不僅轉播，而且還是主要承辦組織單位。最後，這幾年來在台北辦跨年活動的主要政府單位，不是文建會、文化局、觀光局，而是行政院新聞局及台北市新聞處。所以，跨年是媒體事件，在台灣的脈絡下更是如此。

## （三）跨年只是綜藝事件？僅是唱歌跳舞的作秀？

不過，近年來跨年活動，與其他活動類似，不斷地重覆形式而漸失新意。在台灣影劇新聞日受歡迎，影音消費日益發達的環境下，連影劇記者都認爲跨年活動失去了「意義」。影劇記者陳孝凡，以娛樂工業報

馬仔的近身觀察，認為跨年晚會除了有倒數計時，「與平日的演唱會無異」，也順便說一下政府愛「作秀」：

台灣人愛「作秀」，也愛看免費的秀。過去有工地秀，現在有選舉秀，婚喪喜慶、餐廳賣場裡有清涼秀；國家慶典節日，各級政府也一定有大型晚會秀，普天同慶、與民同樂，無處不秀。……政府愛「作秀」，期盼在歌舞昇平中塑造親民愛民形象，讓人民有信心，明天會更好。而日子過得苦哈哈的老百姓，街頭成了免費秀場，也是樂事一樁，至少能發洩悶氣；如除夕夜的台北市，保守估計至少有八場以上的大型跨年晚會，像極了一座超大型秀場。……雖然內容皆是千篇一律的唱歌跳舞，要不是最後的倒數計時，真是與平日的演唱會無異。不過，政府愛「作秀」，當晚讓青少年有正當去處、發洩精力，除夕夜成為平安夜，也算是功德一件。（陳孝凡，2002）

本文同意陳孝凡(2002)跨年晚會與演唱會的比較，明白地指出跨年晚會不過是有「倒數計時」的演唱會。然而，本文對所有大型晚會只剩下「作秀」的評價有點保留。要回答作秀的文化脈絡及政治社會意涵，以下會從跨年活動與競選造勢晚會的交織的紋理，來描述現有台灣的新興晚會，是如何成為媒體、政治、娛樂的多重事件，及其如何影響台灣集體生活節奏。

#### 四、新整合紋理：競選晚會與跨年活動

##### （一）1995-1996 年政治與綜藝的交織

面對陳水扁的政治嘉年華路線，國民黨在 1995-1996 年推出聯合報記者口中的「政治型綜藝」。<sup>(36)</sup> 李登輝總統要競選連任的 1996 年，華視就陸續推出三個政治味十足的晚會活動，而總統副總統候選人李登輝、連戰、及省長宋楚瑜等都在節目唱歌。當時也正是陳水扁市長執政

滿一年多，也依序舉辦過 10 月 25 日終戰飄舞、12 月 2 日立委選舉、及元旦飄旗等活動。若說這當時兩政黨的活動有什麼不同，勉強可以從類型來上看，綜藝習慣上有主持人，表演多以唱歌主；嘉年華會(或舞會)中，主持人不是重心，身體的扮裝才是。比較之下，民進黨陳水扁做為政治人物的參與是扮裝或開舞的，國民黨政治人物則以唱歌為主。

一時新聞分類失效，政治新聞與影劇新聞難分捨；政治人物與新聞主播的娛樂版身體，出現在眾家電視台所辦的活動中；政治與媒體互相交織，舞會、跨年晚會、與政治綜藝節目輪流重覆出現。如其中一個綜藝節目的主持人，是由華視新聞主播崔慈芬擔任，理由是崔慈芬經驗多：她曾主持過陳水扁主政的台北市政府與華視主辦的「共鳴時刻」1995 年台灣光復節飄舞，也曾在國民黨為主的 1995-1996 的跨年晚會幫忙。電視台在競爭，政黨也在競爭，爭人氣、爭熱鬧。

## (二) 1996-1997 年沒有選舉的跨年

1996-1997 年的跨年晚會，也許因為沒有選舉，相關新聞則以宣傳介紹為主，而不復以往的政治人物相關報導。<sup>(37)</sup> 1996-1997 的跨年晚會，以演唱會為主。跨年晚會的確成為秀場，歌星為主的秀場，如同早在陳水扁辦市民之夜之前，如 1991-1992 的跨年無線三台就有的影劇歌星為主、政治人物致詞的跨年晚會，差別在於 1996-1997 節目戶外化、大型化。

## (三) 1999-2001 年「政治」晚會的無所不在

1999-2000 跨年晚會因 2000 年 3 月的總統大選，讓當時民進黨政治人物重操變裝秀，也少不了與民眾一起倒數計時跨年。<sup>(38)</sup> 跨年晚會和競選造勢晚會已幾乎無法區分，選戰如同媒體戰，而 2000 年 3 月總統大選前夕的競選造勢晚會，也讓文化研究者陳光興推論這種以「演唱會」為形式的造勢晚會，是「消費社會牽制政治的具體表現形式」：

2000年3月總統選舉的最後階段以全面性的進入媒體戰，投票夜之前，台灣出現有史以來最大的群眾集會，南北兩地均有近40萬人參與，而其表現形式是以超大型的演唱會方式來出現，扁陣營的氣勢壓倒其他候選人，這是消費社會牽制政治的具體表現形式。(陳光興，2001)

陳光興(2001)在「媒體戰」、「超大型的演唱會」這點說對了，但是否這「是消費社會牽制政治的具體表現形式」，本文則有稍微不同的看法。當然如同陳光興(2001)觀察台灣消費社會的形成所發現的，陳水扁邁向台北市長、總統之路，和「辦活動」關係密切。然而，本文認為競選晚會與跨年活動這兩種類型的活動，儘管有許多類似的地方：的確是以演唱會為主的媒體事件，也同時是音樂消費社會的活動，有時舉辦的夜晚空間還是類似的地方；然而，就日期選定的及參與動員群眾來說，競選晚會仍是政治社會為主，而跨年晚會才是以消費社會為主，或著，說的更精確些，是以媒體為主。比如說，就歌曲的選擇上，競選晚會與跨年晚會就呈現較不一樣的選取：跨年晚會多以唱片公司做區分，而競選晚會當然因政黨的不同而有所不同。這也是為何，如同本文一開始所舉例的「國家級世紀跨年晚會」，辦過市民之夜的總統府團隊為何會焦慮的做市場區隔說：「一個有別於偶像、歌星趕場堆疊的綜藝晚會，……」(陳哲男，2000)。

然而，如同陳光興(2001)所評論的2000年總統大選前夕晚會，競選的動員能力也不會輸給歌星，如同劉雅芳(2002)在分析2000年陳水扁總統競選歌曲專輯《歡喜看未來》敏銳地看到這樣的熱鬧與熱血沸騰集體活動，是有效的(餘音繚繞不止)的記憶傳播，是一個「熱血沸騰的民眾嘉年華會」。台灣近十年來的跨年晚會，每當遇到選舉出現，也難免會變成競選造勢晚會，這個現象不只跨年，幾乎是每一個紀念節日都會遇到的，紀念日被選舉造勢活動所淹埋的情況。<sup>(39)</sup>從一年的節奏來觀察選舉日與紀念日的關係，可以發現，三月總統大選之前有元旦、跨

年，十二月初前後的立委、直轄市長、縣市長選舉前有光復節、國慶；台灣的紀念節慶活動與競選活動幾乎是交織在一起，只要有選舉，節慶的晚會可能有選舉味。未來會放假的紀念節日將只剩下元旦、二二八、與雙十國慶，每個都分別在三月、十二月的選舉前不到百日，紀念日受到選舉影響的情況，值得進一步觀察。

#### （四）跨年晚會結合「演唱會」及「競選晚會」紋理，凝聚台灣為一整體

就媒體而言，競選晚會與跨年晚會都是直播的媒體事件，兩者可能都要處理同時不只一個地方的進度，在同一節新聞甚至是同一個畫面呈現。但做為媒體事件來說，跨年晚會是較競選晚會少些衝突且多同步的。競選造勢晚會中的旗海顏色傳達的是清楚的陣營區分，而跨年晚會所獨有的（也許是唯一有的）倒數計時的集中儀式效果，也只有選舉完晚上的同步開票勉強能比。歡愉、全省連線、各地記者傳回報導、等幾乎是跨年晚會專利。跨年不僅是媒體事件，同時也是媒體的事件。就台灣社會整體的文化情境來說，若觀看是公民的必經儀式，以前看的是閱兵國慶，現在看的是跨年晚會。

跨年晚會做為一種新興節慶，其內容好像是空白的，任由媒體及政治填入內容。早先無線三台在 1992 年前後填入綜藝節目，但還沒成爲一個全民參與（不論是觀看或是參加）的節日活動，後來 1994-1996 年陳水扁的快樂希望的「市民之夜」提案，給予跨年解嚴、重組記憶的意義，接下來的跨年晚會若沒碰上選舉，則是標準的大型戶外演唱會。

本文認爲，就算台灣的跨年晚會雖說是全球連線，仍不是世界公民的晚會，而是關乎台灣整體的，而原因就在於跨年晚會有的「演唱會」及「競選晚會」的兩大紋理上，有著媒體本身、影音工業、與政府、政黨等建制集團的鑿痕。正因為有「演唱會」及「競選晚會」的兩大紋理，這個凝聚台灣整體的活動，跨年晚會，其本身也是空間事件，而這個空間事件本身是媒體節目（綜藝節目與演唱）的空間化，這一點 Dayan &

Katz (1992)並沒有提及，也是本文所強調的台灣跨年晚會的空間活動形式，有最早電視綜藝節目的痕跡。

既然跨年晚會大致上算是凝聚台灣整體的媒體事件、空間活動、儀式，則評斷跨年晚會的好壞，決定於對政黨活動(如造勢晚會)與影音活動(如演唱會)的態度與評價，這部分本文建議未來能以「文化公共領域」來重新概念化分析。本文最後除了為媒體事件概念詮釋台灣新興國家晚會做摘要之外，會試著對未來可能產生的「新提案」做一些推臆。

## 伍、結論

Dayan & Katz (1992)提的媒體事件概念，讓媒體成為當代凝聚社會中心價值與重組集體記憶的要角，台灣新興的跨年晚會就是一例。本文認為，由「綜藝節目—演唱會」及「競選晚會」兩大紋理所組成的跨年晚會，是個在時空、影音上凝聚台灣的媒體事件。借用 Dayan & Katz (1992)將媒體事件描述成主控的(hegemonic)、自稱歷史的(proclaimed historic)的說法，台灣 1994-2003 新興的跨年晚會，呈現的是當時媒體本身、影音工業、與政府、政黨等建制集團的價值與記憶：快樂希望新時代。

本文說明了促進政黨輪替的跨年晚會「市民之夜」，是如何以「快樂」、「希望」的未來，配合「人權」、「悲情」的過去而形成的敘事結構，不僅用來塑造政黨輪替的氣氛，也企圖吸納不同年齡層民進黨的支持者—認同未來與過去。節慶活動一方面改變政治社會的氣氛，也企圖發揮集體記憶的教育功能。跨年晚會的受益者除了逐級執政的陳水扁之外，廣播媒體、綜藝節目、演唱會的組織者與企劃者，也享有不同以往的權力，可以決定晚會的內容與形式。

從 1994 年陳水扁的市民之夜到現在，目前的跨年晚會除了目臨到形式內容重覆的問題之外，也牽涉到從「悲情」到「人權」到「希望」再到「快樂」的敘事現面臨挑戰。跨年晚會做為一個教材，其教育的對

象—青年—是怎麼樣同時接受「希望」的氣氛，又認同過去「人權」的教訓？若 1994-2003 凝聚台灣的主要媒體事件之一是跨年晚會，未來十年凝聚台灣的是什麼？仍然是媒體事件嗎？是哪個媒體事件？

陳水扁面臨執政挑戰的，就是其允諾的「希望」再到「快樂」的敘事是否能兌現，這個問題又因 2000 年來台灣經濟進入中所得國家，而無法維持高經濟成長率而更形緊張：若經濟高成長率就是希望指數的話，希望在哪？這種希望破滅後，轉向懷念解嚴前的威權政府，或對岸的人民共和國政府的心態也開始呈現，因為這兩者都有高經濟成長率的數字。面對未來台灣的歷史及發展，現在可以想像的是，2008 年由中國大陸主辦的奧林匹克運動會，及三年後 2011 年中華民國的百年紀念。媒體、影音工業、與政府、政黨等建制集團，從本文的分析來推論，將仍是要角。屆時，若這種沒有經濟成長就沒辦法「快樂」、「希望」的價值論述沒有改變，則 2008 年奧林匹克運動會，及 2011 年中華民國的百年紀念，成為主要的媒體事件時，將會對台灣目前主控媒體事件的建制集團造成不小的衝擊，包括政黨也包括媒體。

無論是 1994-2003 的陳水扁與新興的有線電視台，還是 2008 年奧林匹克運動會的媒體轉播集團，作者雖不敢小看這些建制集團的能耐，但不太信任這些建制集團會有自主市民社會新提案。<sup>(40)</sup> 媒體事件又不能也不會完全操控在建制集團手中，正如 Alexander & Jacobs(1998)進一步詮釋，媒體事件是一個文化環境，用來補足以理性溝通為基調的公共領域概念的不足。同理，跨年晚會，做為一個媒體事件，或許像競選晚會一樣，能補充如競選電視辯論會的不足。正因為媒體事件如跨年晚會有這方面的重要性，具自主性的市民社會團體更應努力介入目前由媒體、影音工業主導的媒體事件。

如何介入媒體事件，或甚綁架媒體事件？近年來反全球化運動人士及綠色和平組織的抗議活動讓一些媒體理論家重新思考媒體事件的轉換空間。DeLuca & Peebles (2002)延續好幾年對「影像事件」的研究，更進一步對西雅圖反全球化運動以「公共螢幕」的概念來分析，爭論為



得取媒體關注的「不文明不合作運動」與「象徵暴力」是當今媒體環境下的有效手段。Meikle (2002) 也以 1992 年網路運動者提出的「策略性」媒體，如何攔截主流媒體的議題設定能力。換言之，媒體事件的集中凝聚整體的效果，仍是有些許爭取空間的。

若在國慶參加反閱兵遊行曾經是成功經驗，則在跨年的反跨年活動也許是個可能。



## 註釋

- (1) 首都台北來說，總統府前與市政府廣場的跨年晚會，分別是由行政院新聞局、台北市政府新聞處策劃，由民間單位(通常是媒體)競標執行。根據行政院新聞局提供的資料，2000年及2001年底的跨年晚會分別由民生報、紙風車文教基金會與MTV所執行。根據台北市新聞處提供的資料，2000年及2001年底的跨年晚會分別由年代、滾石與TVBS所執行。
- (2) Ceremony一詞，在此採用王志弘(2000)的國家「儀典」空間翻譯(見其未出版的2000年空間與社會講義第五講)。值得一提的是，本文承用日本翻譯西方媒體理論的"ritual view"「儀禮論」，本文就字面上會將ceremony翻譯成儀典，將ritual翻譯成儀禮。
- (3) 在此「政治嘉年華」一語，借用張小虹(1994)對台灣同志運動的描述。張小虹認為，在政治解嚴已逾八年的1996年，同志運動拓展出不同於以往以悲情為主要訴求的社會運動形態，張稱之為「政治嘉年華」。本文認為，民進黨約略同時有類似的轉向，也就是要從悲情走向來，邁向希望。
- (4) 選舉前有「光復台北城」車隊大遊行與「台北之夜」造勢晚會，強調陳水扁將帶給台北新希望，見〈民進黨候選人 車隊遊行壯聲勢〉(朱俊哲，1994年10月26日：14版綜合)。勝選後則有「希望之鐘」響在「市民之夜」的元旦晚會，台北市政府也說明是「特別將歷年來嚴肅的升旗典禮改變為跨年聯歡晚會」，見《聯合報》〈倒數計時迎新年 市長市民跨年聯歡〉(朱俊哲，1995年01月01日：14版綜合)。
- (5) 見《聯合報》〈凱達格蘭大道，見證時代變遷〉(劉時榮，1996年10月22日：17版都會掃描)。
- (6) 國民黨籍現任台北市長馬英九，表示「『終戰日』是日本軍國主義的遮羞布，我們不能用！」，並批評七年前的十月，陳水扁前市府

- 在總統府前廣場舉辦一場「慶祝『終戰』五十年」的飄舞大會。見《聯合報》〈光復節圖片展「重返現場」〉(蔡惠萍, 2002年10月26日: 18)。
- (7) 見《中國時報》〈深入敵營教戰 市長候選人 要比阿扁更創新〉(陳志平, 1997年10月25日: 社會傳真)。
- (8) 見《聯合報》〈二二八 北市訂為和平紀念日〉(朱俊哲, 1995年02月26日: 04 政治)。
- (9) 台灣政府為了配合週休二日政策, 將許多原放假的國定假日改成只紀念不放假(陳鳳馨, 1997年08月13日)。以及今年政府反覆確定, 二二八要放假(羅曉荷、黃煌權, 2002年03月01日)。這些政策轉變, 《聯合報》都放在頭版為做新聞。國定假日的修改另一項議題, 是與縮短工時相關, 由此可以看出曆法的社會時間面向。
- (10) 節日與國族的爭議例子, 見《聯合報》〈擴大紀念二二八 市府別有用心〉(朱俊哲, 1996年02月27日: 14 版綜合); 《聯合報》〈誰來追思〉(林永昌, 2001年11月13日: 13 版綜合); 見《聯合報》〈蔣經國先生逝世十三周年 大批黨政要員行禮鏡頭不復見 但仍有不少民眾前往追思〉(胡若梅, 2001年01月14日: 9 版社會話題)。
- (11) 據報載, 行政院會 2002 年討論的「紀念日及節日實施條例」草案中, 列入紀念日的共有十個, 分別是開國紀念日(元旦)、228 和平紀念日、國父逝世紀念日、革命先烈紀念日、先總統蔣公逝世紀念日、孔子誕辰紀念日、國慶日、先總統蔣公誕辰紀念日、國父誕辰紀念日及行憲紀念日。見《經濟日報》〈紀念日節日放假 有法可循: 元旦、228、國慶日及民俗節日放假 其餘只紀念〉(陳秀蘭, 2002年09月25日: 6 版/ 綜合新聞)。
- (12) 不過, 能放假的紀念日只有元旦、二二八和平紀念日及國慶假日, 另外民俗節日, 如春節等, 包括原住民族歲時祭儀, 也可以放假。以上的安排, 根據行政院核定「中華民國九十二年紀念日及節日

假期處理一覽表」確定在民國九十二年開始實施。詳情播「假期語音查詢專線」（02-23569997）或見人事行政局全球資訊網首頁「HOT NEWS（最新消息）」2002年10月7（網址：<http://www.cpa.gov.tw>）。

- (13) 見《中國時報》〈刑法第一百條 廢法十周年 陳水扁、李鎮源重返戰地祈福〉（林照真，2000年10月08日：社會綜合）。
- (14) 台灣「新公民」的演唱會在二二八公園舉行，台灣陳水扁政府的人權訴求，要記得的是二二八及美麗島事件所代表的台灣本土，而青年節這節日原來是紀念中華民國建國的革命，原本要記得的是三二九因「青年拋頭顱、灑熱血」的現代中國誕生。台灣「人權」對上中國「革命」，這所代表的「意義的爭奪」是當今集體記憶最富表面政治意涵的地方，就發生在三二九的二二八公園。見灣人權促進會網站。（網址：<http://www.tahr.org.tw/active/2002.03.29.htm>）
- (15) 見《中央社》〈民進黨三十一號中壢市 變裝秀跨年晚會〉：「(中央社記者陳幼臻台北三十日電) 為迎接千禧年的到來，民主進步黨明晚將在中壢市 SOGO 百貨旁，舉辦「台灣新家庭、歡喜看未來」跨年晚會。晚會以政治人物變裝秀為主題，多位民進黨大老及民意代表將裝扮成愛因斯坦、卡門及蝙蝠俠等，民進黨總統、副總統參選人陳水扁及呂秀蓮將帶領民眾一起倒數計時跨年。」(1999年12月30)。台灣文化研究學者張小虹就有針對政治人物的扮裝現象做評論，見《中國時報》〈政治金光秀 一場戲夢人生？〉（張小虹，1998年11月30日：時論廣場）。
- (16) 紐約跨年活動最早是由紐約時報 (The New York Times) 所舉辦，為的是紐約時報的新總部大樓落成，並將廣場重新命名為時報廣場 (Times Square)。
- (17) 見《中央日報》〈連戰出席 跨年 晚會帶領倒數計時期許今年會更好〉(1997年01月01日：第1版)、《中國時報》〈六萬民眾

守歲 再見 1997！〉(陳孝凡，1997年01月01日：社會傳真)、及《聯合報》〈眾家電視台迎新春 跨年晚會爭輝映〉(耿暄，1996年12月31日：第23版影視資訊)。

- (18) 張瑞德(1998)研究 1995 年兩岸的對抗戰勝利的五十週年紀念活動，認為台灣社會雖然較大陸為開放，但主要的文化生產者仍主要是國家機構或政黨，而與西方主要以市民社會團體(“civil society” groups)不同。張瑞德(1998)也認為兩岸都還沒有濃厚的商業色彩，與後現代社會紀念活動的商業化不同。本文對於跨年活動的理解是，主要的文化生產者愈來愈是政府與媒體的合作，而政府的角色愈來愈淡，所以要問跨年活動的生產是不是市民社會的產物，要問參與的媒體是不是市民社會團體。
- (19) 見早期《中國時報》元旦新聞頭條的一些例子都顯示，兩蔣時期的元旦「大陸同胞」與「現代中國」是不能忘的：

民國五十八年	今逢五十八年元旦 總統書勉全國軍民 奮起復國誅毛賊
民國六十年	欣逢中華民國建國六十年元旦 總統勉同胞奮起 導發大陸再革命
民國七十年	蔣總統七十年元旦祝詞 勉勵同胞團結奮發 迎接重光大陸年代

- (20) 見《中國時報》〈家破山河變 簡單過雙十〉(林淑玲，1999年10月11日：焦點新聞)。
- (21) 見《中國時報》〈「綠色國慶」 政黨和解長路漫漫〉(張瑞昌，2000年10月11日：焦點新聞)。
- (22) 見《中國時報》〈內緊外憂 雙十國慶活動 一切從簡〉(徐孝慈，2001年10月10日：焦點新聞)。
- (23) 見《中國時報》〈金馬獎掀「政治」風波 新聞局長發飆：不出席、不補助〉(林淑玲，2002年11月15日：焦點新聞)。

- (24) 本文將 media 翻譯成媒體，而不是媒介，是爲了強調媒體做爲一個組織的較窄的定義。
- (25) 見該書的附錄 Appendix : Five Frames for Assessing the Effects of Media Events，可以看出該書借用了不少文化人類學的概念，但還是從「說服研究」(persuasion research)傳統出發，借道「批判典範」(Critical paradigm)，「滿足研究」(gratifications research)，與「科技理論」(technology theory)。本文認可 Dayan & Katz (1992)面對電子媒體多樣化，觀眾區隔化的走向，修正媒體效果論來處理了社會整體性的新課題。
- (26) 原文爲媒介事件，不過本文翻成媒體事件理由參見註(24)。
- (27) 作者在台灣大學所開的課【數位圖書館與數位典廠】中，教師與廠商特別強調當所有新聞影片數位化後，必能有效增加目前電視新聞的深度。
- (28) Guy Debord，這位老牌的法國情境論者，曾相信的是 1968 年法國學運前後的企圖把藝術與生活結合的節慶嘉年華。Guy Debord 以「奇觀的社會」(society of spectacle)一詞，解說爲「虛假意識的場所，是導治政治昏的擴展帝國，讓當代的大眾社會對於企業菁英的不公不義和霸權免疫」。
- (29) 見《聯合報》〈黃信介看閱兵：對軍力更認識〉(彭威晶，1991 年 10 月 11 日：第 3 版焦點新聞)。
- (30) 見《聯合報》〈周清玉在彰化縣的國慶大會中提出一個值得沈思的問題：當年唸台大，佇立一天一夜等看閱兵不以爲苦，爲何今日有師生發起的反閱兵行動？〉(何漢，1991 年 10 月 11 日：第 3 版焦點新聞)。
- (31) 見《聯合報》〈綠色國慶，觀禮台主角換人坐了〉(陳敏鳳，2000 年 10 月 10 日：第 3 版話題新聞)。
- (32) 見總統府新聞稿〈總統副總統參加中華民國九十年跨年晚會活動〉(總統府網站，2001 年 12 月 31 日：見 [www.president.gov.tw](http://www.president.gov.tw))。

- (33) 本文還不能斷定當時陳水扁所主導的每一個活動及媒體事件有引發改變的力量，但退一步說陳水扁的訴求與當時正在進行公共空間解嚴與青少年身體解放相輔相成應不會太過。見《聯合報》〈民進黨候選人，車隊遊行壯聲勢〉(朱俊哲，1994年10月26日：第14版綜合)。見《聯合報》〈市府廣場 將開放民間使用〉(朱俊哲，1994年12月17日：第13版焦點)。
- (34) 見《聯合報》〈《本報民意調查》多半認為和選舉是兩碼事：飄舞 年輕人心中無黨〉(詹三源，1995年11月12日：第14版綜合)、〈《總統府前升旗推擠衝撞事件》元旦飄旗 新興「空間政治學」〉(林平華/教，1996年01月02日：15民意)、〈解構威權，介壽路警衛，規定已悄悄放寬〉(劉福奎，1994年10月30日：第7版社會)。
- (35) 見《聯合報》〈總統府前飄舞 在野議員不以為然：李慶安批評黨主席為選票有失立場 新黨要求比照辦晚會〉(牛慶福 董智森，1994年10月18日：第14版綜合新聞)、〈總統也陪你唱唱跳跳〉(楊金嚴，1994年10月3日：第5版生活)、〈狂飄之後那一夜 心的共鳴〉(胡平/油畫家，1995年10月27日：第11版民意論壇)、〈舉辦飄舞酷？ 三黨代表辯！〉(郭乃日，1995年10月26日：第3版焦點)、及〈掌握時效 領先時勢 立論中立 大選大家愛談〉(江聰明，1995年10月29日：第22版影視廣場)。
- (36) 見《聯合報》(耿暄，1996年01月23日：第26版影視廣場)。
- (37) 見《聯合報》〈眾家電視台迎新春 跨年晚會爭輝映〉(耿暄，1996年12月31日：第23版影視資訊)。
- (38) 見中央社〈民進黨三十一號中壢市 變裝秀跨年晚會〉(陳幼臻，1999年12月30)。
- (39) 見《聯合報》〈歷史圖片展 廣場音樂會〉(蔡惠萍，2001年10月22日：第20版台北生活)。
- (40) 如1995年在台北市長陳水扁與總統李登輝的執政下，工人立法行

動委員會申請借用博愛特區遊行，辦「工人與總統有約」晚會的企圖，就被市府唯恐立委候選人比照辦理為由而拒絕。見《聯合報》〈申請借用博愛特區遊行遭拒 工委會指市府只准州官放火〉(詹三源，1995年11月12日：第14版綜合新聞)。





## 參考書目

- 牛慶福與董智森(1994.10.18)。〈總統府前颯舞，在野議員不以為然：李慶安批評黨主席為選票有失立場，新黨要求比照辦晚會〉，《聯合報》，第14版。
- 朱俊哲(1994.10.26)。〈民進黨候選人，車隊遊行壯聲勢〉，《聯合報》，第14版。
- 朱俊哲(1994.12.17)。〈市府廣場，將開放民間使用〉，《聯合報》，第13版。
- 朱俊哲(1995.1.1)。〈倒數計時迎新年 市長市民跨年聯歡〉，《聯合報》，第14版。
- 朱俊哲(1995.2.26)。〈二二八北市訂為和平紀念日〉，《聯合報》，第4版。
- 朱俊哲(1996.2.27)。〈擴大紀念二二八，市府別有用心〉，《聯合報》，第14版。
- 江聰明(1995.10.29)。〈掌握時效，領先時勢，立論中立，大選大家愛談〉，《聯合報》，第22版。
- 何漢(1991.10.11)。〈周清玉在彰化縣的國慶大會中提出一個值得沈思的問題：當年唸台大，佇立一天一夜等看閱兵不以為苦，為何今日有師生發起的反閱兵行動？〉，《聯合報》，第3版。
- 林平華(1996.1.2)。〈《總統府前升旗推擠衝撞事件》元旦颯旗，新興「空間政治學」〉，《聯合報》，第15版。
- 林永昌(2001.11.13)。〈誰來追思〉，《聯合報》，第13版。
- 林淑玲(1999.10.11)。〈家破山河變 簡單過雙十〉，《中國時報》，焦點新聞。
- 林淑玲(2002.11.15)。〈金馬獎掀「政治」風波，新聞局長發飆：不出席、不補助〉，《中國時報》，焦點新聞。
- 林照真(2000.10.8)。〈刑法第一百條，廢法十周年，陳水扁、李鎮源重返戰地祈福〉，《中國時報》，社會綜合。
- 胡平(1995.10.27)。〈狂颯之後那一夜，心的共鳴〉，《聯合報》，第11版。

- 胡若梅(2001.1.14)。〈蔣經國先生逝世十三周年，大批黨政要員行禮鏡頭不復見，但仍有不少民眾前往追思〉，《聯合報》，第9版。
- 夏春祥(1998)。〈文化象徵與集體記憶的競逐——從台北市凱達格蘭大道談起〉，《台灣社會研究季刊》，31：21-54。(集體記憶與意識型態專題)。
- 徐孝慈(2001.10.10)。〈內緊外憂，雙十國慶活動，一切從簡〉，《中國時報》，焦點新聞。
- 耿暄(1996.1.23)。〈政治型綜藝，春節起陸續登場〉，《聯合報》，第26版。
- 耿暄(1996.12.31)。〈眾家電視台迎新春，跨年晚會爭輝映〉，《聯合報》，第23版。
- 張小虹(1994)。〈同志情人，非常慾望——台灣同志運動的流行出擊〉，《慾望新地圖——性別·同志學》，頁50-77。台北：聯合文學。
- 張小虹(1998.11.30)。〈政治金光秀，一場戲夢人生？〉，《中國時報》，時論廣場。
- 張瑞昌(2000.10.11)。〈「綠色國慶」，政黨和解長路漫漫〉，《中國時報》，焦點新聞。
- 張瑞德(2001[1998])。〈紀念與政治——台海兩岸抗戰勝利五十週年紀念活動的比較〉，盧建榮(編)《文化與權力：臺灣新文化史》，頁149-206。台北：麥田。
- 郭乃日(1995.10.26)。〈舉辦颯舞酷？三黨代表辯！〉，《聯合報》，第3版。
- 陳幼臻(1999.12.30)。〈民進黨三十一號中壢市，變裝秀跨年晚會〉，《中央社》。
- 陳幼臻(1999.12.30)。〈民進黨三十一號中壢市，變裝秀跨年晚會〉，《中央社》。
- 陳光興(2001)。〈台灣消費社會形成的初步思考〉，《文化研究月報》，2 [Online]。Available:  
[http://www.ncu.edu.tw/~eng/csa/journal/journal\\_park\\_6.htm](http://www.ncu.edu.tw/~eng/csa/journal/journal_park_6.htm)
- 陳孝凡(1997.1.1)。〈六萬民眾守歲，再見1997！〉，《中國時報》，社會傳真。

陳孝凡 (2002.1.3)。〈『作秀』好處多〉，《中國時報》，影視娛樂版。

陳志平 (1997.10.25)。〈深入敵營教戰，市長候選人，要比阿扁更創新〉，《中國時報》，社會傳真。

陳秀蘭 (2002.9.25)。〈紀念日節日放假，有法可循：元旦、228、國慶日及民俗節日放假，其餘只紀念〉，《經濟日報》，第6版。

陳哲男 (2000)。〈錯過這一次，再等一百年〉，《官方網站：總統府週記》，[Online]。 Available:

[http://www.president.gov.tw/1\\_art/weekly/891225.html](http://www.president.gov.tw/1_art/weekly/891225.html)

陳敏鳳 (2000.10.10)。〈綠色國慶，觀禮台主角換人坐了〉，《聯合報》，第3版。

陳鳳馨 (1997.8.13)。〈連戰批定每月兩次周休二日：公務員明年起實施：八個國家假日不放假，二二八放不放仍有變數〉，《聯合報》，第1版。

彭威晶 (1991.10.11)。〈黃信介看閱兵：對軍力更認識〉，《聯合報》，第3版。

楊金嚴 (1994.10.3)。〈總統也陪你唱唱跳跳〉，《聯合報》，第5版。

詹三源 (1995.11.12)。〈《本報民意調查》多半認為和選舉是兩碼事：飄舞，年輕人心中無黨〉，《聯合報》，第14版。

詹三源 (1995.11.12)。〈申請借用博愛特區遊行遭拒，工委會指市府只准州官放火〉，《聯合報》，第14版。

劉時榮 (1996.10.22)。〈凱達格蘭大道，見證時代變遷〉，《聯合報》，第17版。

劉雅芳 (2002)。〈邁向一個民眾觀點的民眾音樂研究：國家族想像、城鄉意涵、日常生活以《歡喜看未來》2000年陳水扁總統競選歌曲專輯為例〉，《文化研究月報》，13 [Online]。 Available: [http://www.ncu.edu.tw/~eng/csa/journal/journal\\_park84.htm](http://www.ncu.edu.tw/~eng/csa/journal/journal_park84.htm)

劉嘉芳 (1997.1.1)。〈連戰出席跨年晚會，帶領倒數計時，期許今年會更好〉，《中央日報》，第8版。

劉福奎 (1994.10.30)。〈解構威權，介壽路警衛，規定已悄悄放寬〉，

《聯合報》，第7版。

蔡惠萍 (2001.10.22)。〈歷史圖片展，廣場音樂會〉，《聯合報》，第20版。

蔡惠萍 (2002.10.26)。〈光復節圖片展，「重返現場」〉，《聯合報》，第18版。

羅曉荷與黃煌權 (2002.3.1)。〈228 受難者將獲回復名譽證書：明列受難事實，約四月實施，未來二二八放假，國定假日逢周休二日不再補假〉，《聯合報》，第1版。

龔浩群(2002)。〈公共領域的雙重要求：評析九一一事件與中國的媒介事件〉。《文化研究網 www.culstudies.com——個案研究》[Online]。 Available: <http://www.culstudies.com/911.htm>

Alexander, J. & Jacobs, R. (1998). Mass communication, ritual and civil society. In T. Liebes & J. Curran (Eds.), *Media, ritual and identity* (pp. 23-41). London: Routledge.

Cressy, D. (1989). *Bonfires and Bells: National memory & the Protestant calenda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Dayan, D. & Katz, E. (1992). *Media events: The live broadcasting of histo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Debord, G. (1977).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Black and Red Trans.). Detroit: Black and Red. (Original text published as *La societie du spectacle* (1969) Paris: Editions Buchet-Chastel)

DeLuca, K. M. & Peeples, J. (2002). From public sphere to public screen: Democracy, activism, and the “violence” of Seattle, *Critical Studies in Media Communication*, 19(2): 122-151.

Garcia, D., & Lovink, G. (1997). The ABC of tactical media, *Nettime*. 16 May 1997. [Online]. Available: <http://amsterdam.nettime.org/Lists-Archives/nettime-1-9705/msg00096.html>

Gillis, J. R. (1994). *Commemorations: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 identity*.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Habermas, J. (1962/1989).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 sphere* (T. Burger, Tran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Lévi-Strauss, C. (1963). The effectiveness of symbols. In C. Lévi-Strauss, *Structural anthropology* (Vol. 1). New York: Basic Books.
- MacAloon, J. J. (1984). *Rite, drama, festival, spectacle: Rehearsals toward a theory of cultural performance*. Philadelphia: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Human Issues.
- Meikle, G. (2002). *Future active: Media activism and the internet*. New York: Routledge & Australia: Pluto Press.
- Nora, P. (1989). Between memory and history: Les Lieux de Memoire. *Representations*, 26: 16-17. [Online]. Available: <http://links.jstor.org/sici?sici=0734-6018%28198921%290%3A26%3C7%3ABMAHLL%3E2.0.CO%3B2-N>
- Nora, P. (2002). The reasons for the current upsurge in memory. *Transit-Europaeische Revue*, 22 [Online]. Available: <http://www.iwm.at/t-22txt3.htm>
- Ozouf, M. (1988). *Festivals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A. Sheridan, Tran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Sun, W. (2001). Media events or media stories? Time, space and Chinese (trans)nationalis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4(1): 25-43.
- Weber, M. (1946).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Zelizer, B. (1992). *Covering the body. The Kennedy assassination and the shaping of collective mem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From Commemorations to Carnivals :  
A Media Event Analysis of 1994-2003 Taiwan's New Year Eve Party**

Han-Teng Liao \*

**Abstract**

The New Year Eve Party, which was launched by President Chen, is characteristic of Taiwan's national events during the past decade. It is not only an event marking the first peaceful political transition in Taiwan but also serves as a template for media events. The study of New Year Eve Party can thus throw light upon the way how President Chen organizes parties and festivals with a view to fostering a climate favorable to the transition.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New Year Eve Party in terms of the concept of "media event". The media have played a role which they did not assume in the old regime. The media not only organize new festivals, produce new spectacle and historical events but also create new collective memory. The New Year Eve Party can be thus said to be an event for the media.

**Keywords:** new year (foundin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national day, media events, collective memory, New Year Eve Party, ceremony

---

\* Han-Teng Liao is finishing his Master Degree at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Journalism,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